

# 阿富汗的伊斯兰教

东方晓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进入阿富汗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大多数阿富汗居民的信仰。然而，由于极为复杂的原因，伊斯兰教又不得不与一些前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信仰体系分享阿富汗人的精神世界。阿富汗的宗教阶层主要包括毛拉、圣族或圣门的后裔及苏菲派皮尔，由于阿富汗的部落社会特征，宗教阶层或高踞社会之上，或处于社会之外，从而形成阿富汗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与阿富汗分散、落后的部落社会结构相适应，阿富汗的宗教设施也有自己的特征。苏菲教团是阿富汗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阿富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阿富汗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 阿富汗 伊斯兰教 苏菲

**作者简介** 东方晓，本名张晓东，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从公元 651 年东伊朗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开始，伊斯兰进入阿富汗地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期间，由于地理、人文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极为复杂的原因，阿富汗实际上处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然而，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却一再以不同形态进入国际政治的漩涡中心，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由此，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它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我看来，研究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将为理解阿富汗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及未来走向提供重要的线索，在学术上，也远比一般地把阿富汗作为热点来讨论更有意义。

## 大众的信仰

除了极少数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犹太人，阿富汗境内的居民大都是穆斯林，其中约 80% ~ 90% 是逊尼派的哈乃斐派，其余则是什叶派。从种族与教派的关系来看，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如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俾路支人等大都属于逊尼派，什叶派的主体则是哈扎拉人。由于阿富汗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因此，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伊斯兰教都有广泛的影响，该宗教不仅提供了一整套的信仰与道德体系，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而且很大程度上还为整个社会构建了某种约束和调节机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阿富汗的大部分人文知识和智力活动主要是由宗教机构和宗教阶层予以传承的，因此，伊斯兰教无可避免地在阿富汗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深印记。“在一个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民族的概念发育未久，国家与社会两相分离，人们只效忠于地方公社，伊斯兰教是惟一可以构成所有阿富汗

汗人共性的东西,”<sup>①</sup> 可以认为, 伊斯兰教是“阿富汗文化的中枢神经”<sup>②</sup>。

然而,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 阿富汗的伊斯兰教有着浓厚的地方特征, “除了信仰安拉和其使者穆罕默德, 大部分的信条都与地方化的、前伊斯兰时期的习俗有关, 有一些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信念甚至与伊斯兰经典所载明的原则相违背。”<sup>③</sup> 比如, 圣徒崇拜和对圣徒陵墓的崇拜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广为流行。所谓圣徒, 他们可以是苏菲教团的皮尔 (导师), 也可以是圣族或圣门的后裔, 有时甚至普通毛拉和游方苦行僧也可因其学识、人品或特异的行为举止和有别于常人的能力而成为圣徒。这些人活着时受到人们尊敬, 有的还有大批追随者和崇拜者, 死后的陵墓则成为圣地 (ziyarat), 受到人们朝拜。人们对圣徒及圣墓的崇拜是希望得到安拉的庇护和赐福 (barakat), 但在许多情形下是受到一些更为世俗和更为实用的动机的驱使。比如, 贾拉拉巴德附近的一个圣徒陵墓可以治疗神经病, 而分别位于查里卡尔 (Charikar) 和科希达曼 (Kohidaman) 的两个圣地则以治疗狂犬病而闻名遐迩。在喀布尔北面的帕伊米纳尔山谷 (Valley of Paiminar) 约有 40 多个圣徒陵墓, 它们无一例外地可以使妇女得到生儿育女的能力。阿富汗各地的圣徒陵墓都有守护人, 而所有的守陵人都向前来朝拜者兜售护身符和其他的神符 (ta'wiz), 这些护身符不过是一些魔咒谶语, 有的干脆是从《古兰经》抄来的启示和预言, 他们把这些所谓的护身符装入用布、皮革或者金属制作的小袋中, 缝在求购者的衣服上。在阿富汗人看来, 这样的护身符几乎可以满足善男信女们的任何愿望, 从拴住情人的心到增强性功能、从一般的趋利避害到在部落械斗中避开致命的枪弹, 这些护身符可谓无所不能。

在阿富汗, 许多与伊斯兰教无关的习惯也有相当的影响, 这些民间信仰与习俗有的可能与曾经在这一地区流行的某些宗教, 如祆教、佛教、萨蛮教等有关; 有的则带有浓重的民间迷信色彩。在阿富汗的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 有一个叫“沙里夫-阿里”的地方, 在那里圣徒陵墓一个接着一个, 成千上万的鸽子居住在圣徒陵墓之间, 当地人相信, 每 7 只鸽子中就有 1 只是阿尔瓦 (arwa, 神灵), 因此, 到圣陵朝拜的人都把喂鸽子作为强化宗教信仰、增加宗教荣誉的重要方式; 如果有人杀死了一只鸽子, 而它恰巧是一个阿尔瓦, 那么此人将在睡梦中不断受到阿尔瓦的折磨与缠绕。在阿富汗的许多地区, 村民们总是把剪掉的毛发和指甲小心翼翼地掩埋起来, 以防被那些别有用心或与自己有仇隙的人发现。据说, 巫婆用蜡、粘土或其他材料做成小人能够咒人致死, 如果把被诅咒者的毛发或指甲混入小人像, 那么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在宗教信仰中, 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并存混杂的现象反映了阿富汗独特的历史与人文特征。阿富汗处于欧亚大陆的核心, 地缘特征使阿富汗千百年来经历了众多的民族迁徙和文化巨变。一方面, 这种历史遭遇使阿富汗的文化内涵从总体上趋于多元化与丰富多彩。但另一方面, 由于变化的突发性和频繁性, 所有重要的文明总是与阿富汗擦肩而过, 能够留给阿富汗人、或者说阿富汗人能够记起的不过是某些历史与文化的片断。同时, 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往的角度来说, 阿富汗是驿站, 而非最终目的地; 是十字路口, 而不是融会贯通和发扬光大之所。由此, 我们看到, 阿富汗在历史上不乏短暂的灿烂与辉煌, 在现今的阿富汗各地也不难发现优秀文明的历史碎片。然而, 能够称为阿富汗文化底蕴和历史遗产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阿富汗人甚至没有形成可以传承的文字、语言及智力成果, 后世的人们不得不在民间口头文学中寻找阿富汗的发展轨迹, 或在古代中国、波斯和印度等国的典籍中钩沉阿富汗的历史线索。伊斯兰教兴起后, 阿富汗曾经历过几个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期, 比如萨曼王朝时期和加兹尼王朝时期。然而, 相对于长时间、高烈度的战争与动乱来说, 这种经济与文化繁荣的时间还是太短, 无论是在此期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还是智力成果, 都不足以对阿富汗社会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15 世纪, 随着帖木尔帝国 (1370 ~ 1506 年) 的兴起, 阿富汗再次迎来了

①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0.

② Michael Barry, *Le Royaume de l'Insolence: La résidence afghane du Grand Moghol l'invasion soviétique*, Paris: Flammarion, 1984, p. 57.

③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4.

一个比较长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时期,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巴尔赫、加兹尼,以及中亚地区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不仅成为帖木尔帝国的经济与商业中心,而且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文化与科学的荟萃之所。<sup>①</sup>然而,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这种繁荣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从16世纪开始,一场更持久的衰落降临在这一地区。同以往一样,阿富汗的衰落首先与战乱有关,为了争夺对阿富汗的控制权,伊朗的萨法维王朝(1501~1732年)与印度的莫卧儿王朝(1526~1707年)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莫卧儿控制着喀布尔,萨法维则占领赫拉特,处于中间线上的坎大哈数易其手”<sup>②</sup>,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747年阿赫默德在阿富汗建立独立的杜拉尼王国。与连年战乱同时发生的是连接欧亚大陆贸易路线的巨大变化,美国学者拉皮达斯就此评论道,“……萨法维王朝的崛起、伊朗通往印度洋商路的关闭、俄国对伏尔加地区的征服以及内部秩序与安全的丧失,所有这些都大大削弱了亚洲内陆的贸易。而连接欧洲与印度海上航道的发现,以及随后俄国跨越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扩张所开通的至中国的新商道,更使亚洲内陆的贸易进一步衰落。亚洲内陆不仅断绝了与经济富庶地区的联系,也断绝了与文化先进地区的来往,那些曾经给这一地区带来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与文化影响的商道被弃置不用,与外部穆斯林世界的密切联系也不复存在,于是,地方主义盛行,经济衰落,政治上四分五裂。”<sup>③</sup>商路的改变和亚洲内陆贸易的衰落对于阿富汗的影响尤为巨大,那些原来主要靠商队维持繁荣的城镇全面走向衰落,“经济与政治的重心逐步向农村转移,向控制土地财富转移,……阿富汗沦落到了‘文化的边缘’”<sup>④</sup>。

由此,关于阿富汗人的宗教信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简约的结论。其一,大部分阿富汗人无疑是虔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构成了阿富汗人精神生活的主体;其二,在阿富汗人的信仰世界,大量非伊斯兰和前伊斯兰的因素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从总体上,这一现象反映了阿富汗在种族和文化起源上的多元性;其三,阿富汗智力成果和人文传统的匮乏是各种信仰体系混杂并存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当阿富汗与伊斯兰最重要的知识中心逐步隔绝后,伊斯兰教不得不与其他信仰体系分享阿富汗人的精神世界。

## 宗教阶层与宗教设施

传统上,阿富汗伊斯兰宗教权威的形成主要有3个来源,即学识、出生和神秘社团。与此相适应,阿富汗宗教阶层也主要由3种人士组成,毛拉(Mullah)——乌勒玛(“Ulema”,宗教学者)、圣族或圣门后裔(“Sayyids”和“khwajas”)和皮尔(pir)。在阿富汗各地,广泛存在的初级宗教学校(maktabas)是人文与宗教知识的重要传播场所,也是毛拉的培养地,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有的进入乡村清真寺成为伊玛目(Imams);有的到宗教学校任教或自办宗教学校;还有一些进入较高级的宗教学校(Madaras)继续接受宗教教育,成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乌勒玛。一般来讲,阿富汗的乌勒玛大多没有显赫身世,从小就在初级宗教学校或清真寺诵读《古兰经》,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随着学识的增长则进入较高级的宗教学校、或者到国外的学校学习,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宗教知识获取社会的尊重。赛义德,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而和卓则是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的后裔<sup>⑤</sup>,这些人不一定接受过宗教教育,但他们却因与圣族或圣门弟子的联系而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地位。在许多阿富汗人看来,这些人高贵的血统已使他们获得了某种超凡入圣的特质,他们不仅可以赐福于追随者,而且可保一方平安。皮尔是精神导师,他们活着时有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死后的陵寝往往成为圣地而受

①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81.

② Arnold Fletcher, *Afghanistan: Highway of Conquest*, Iahaga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8.

③ Ira M. Lapidus, op. cit., p.426.

④ Asta Olesen, *Islam and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Curzon Press Ltd., 1995, p.43.

⑤ 有的文献认为和卓也指哈里发欧麦尔的后裔。——作者

到人们的朝觐。阿富汗各地都有自己的皮尔,其影响有的是地域性的;有的则声名远播。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皮尔都具有宗教知识,有的因治病救人而受到尊敬;有的则因其先人能够赐福于世人而获得皮尔的称号,在大多数情况下,皮尔总是与苏菲教团连在一起。需要强调的是,在阿富汗,乌勒玛、皮尔及圣族和圣门的后裔并不是彼此排斥、互不相干的 3 个群体,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身份是相互重迭、甚至合而为一的。特别是在阿富汗的北部地区,乌勒玛经常受到皮尔那样的尊敬,他们也常常借助宗教给人治病,并由此建立自己的名望。<sup>①</sup>

与正统派伊斯兰(逊尼派)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阿富汗没有正式的、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然而,实际上,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还是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别。圣族或圣门的后裔因其不寻常的出生而获得人们的尊敬,特别是一些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赛义德与卓有意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博取社会声望与政治影响。皮尔和乌勒玛的地位较高,他们或因学识而声名远播;或因财产而富甲一方。有的皮尔或乌勒玛开办学校、传授门徒;有的则作为地方贤达一言九鼎,直接对有关事务发挥影响,特别是社会处于危机时,更有一些皮尔或乌勒玛获得了跨地区的影响。因此,这一部分宗教人士不属于任何部落和家族,也不属于任何种族集团,他们是处于部落社会之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处于底层的是普通的乡村毛拉,他们出身贫寒,没有显赫身世,只是因为接受了一些极为初级的宗教教育而成为毛拉,他们能够进入乡村的某个清真寺,并不是得到了更高级宗教人士的任命,而是乡民集体选择的结果。乡村清真寺没有多少寺产,人们的宗教捐赠也十分有限。因此,乡村毛拉要过上体面的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许多情形下,他们必须靠自己向村民提供的“服务”赚取更多的收入。这些服务包括主持婚庆与丧葬仪式、在施行洗礼和割礼时进行祷告、向村童提供启蒙教育,等等,有时他们还充当木匠、医生,在这样的情形下,毛拉与乡村的普通手艺人没有什么区别。乡村毛拉实际上是一个处于部落社会之外而又严重依赖部落社会的阶层。一般来说,在阿富汗的部落地区,毛拉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在非部落地区,他们的地位则因其学识和财产稍有变化。

在阿富汗,主要的宗教设施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Maktabas”和“Madrasas”)、道堂(Khanaqah)以及圣墓(Ziyarat)等。清真寺是穆斯林祷告与聚礼之处;道堂是苏菲教团的活动场所;而圣墓则是一些有名望的宗教人士的陵寝,他们经常吸引无数虔诚的朝觐者。也许,在阿富汗最值得注意的是遍布各地的宗教学校,在伊斯兰化以来的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学校不仅为伊斯兰的传播与延续培养基层的宗教骨干,而且为宗教领袖发挥社会影响提供了某种制度保证:通过垄断教育机构和智力活动及其成果,通过建立联系紧密的师生网络,宗教领袖成为凌驾于阿富汗社会之上的重要力量。

阿富汗的宗教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初级宗教学校,叫做马克塔布(maktab),一般总是附属清真寺。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当然是男性)来说,能够到清真寺用阿拉伯语学习《古兰经》已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最好教育。在这种初级学校中,任教的多为清真寺的伊玛目,他们一般都能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然而,事实上他们对阿拉伯语却是不甚了了。在许多情形下,乡村的伊玛目只是个领拜人,他们不懂阿拉伯语,更没有伊斯兰教的高深知识,他们教给孩子们的不是关于生老病死及礼拜、把斋等方面的最基本的宗教知识和礼仪。要想接受更正规的宗教教育,人们必须进入马德拉萨(madrasa)——一种较高级的宗教学校。关于马德拉萨的起源与发展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尼扎米·穆尔克(Nizami al-Mulk, 1018/1019—1092)于 1065 年在巴格达建立的尼扎米经学院(the Nizamiyah madrasah)不仅规范了马德拉萨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而且使马德拉萨成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某种制度化的宗教设施。正是从那时起,马德拉萨不仅遍及伊拉克、呼罗珊等地,而且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主要城市出现。<sup>②</sup>

① Olivier Roy, op. cit., p.38.

② John Esposito (ed.), *The Islamic World*, Vol. 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16.

大致说来，阿富汗的马德拉萨主要有下列一些特点。

1. 规模小，开设课程单一。在阿富汗，大多数马德拉萨只有一名教师，因此，不管有多少学生，老师在一段时间里只开设一门课。然而，与一般所理解的授课形式不同，教师讲课时往往是一对一，教授一门课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因人而异，基本以学生是否能完全掌握为准。从理论上讲，马德拉萨的教师应该拥有多学科的知识，但实际上，他们只能精通某一学科，由此，在阿富汗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声名远播的马德拉萨只具有某一学科的优势，一个学生要想在学识上得到全面发展，他就必须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于是，“游学”成为著名宗教学者成长的必由之路。

2. 阿富汗的马德拉萨受到外部世界的严重影响。在经历帖木尔帝国所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阿富汗地区陷入了周边帝国的长期纷争之中，对致力于宗教学问的学生——塔利卜（talib）来说，要想成就一番学业必须离开阿富汗，前往相邻地区，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印度次大陆的迪奥班德、巴雷利、戈帕尔、德里、海德拉巴和斯瓦特等地，都是阿富汗塔利卜经常选择的留学之地。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似乎更愿意前往较近一点的瑙什拉和白沙瓦等地的马德拉萨求学，而这些地区的马德拉萨基本是迪奥班德经学院（1867年建立）的翻版。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迪奥班德经学院的宗教与社会理念在阿富汗产生了广泛影响<sup>①</sup>。

3. 伴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整体衰落，马德拉萨的课程设置逐渐远离现实。在伊斯兰文明的鼎盛时期，宗教学校不仅要培养合格的乌勒玛，而且要培养深谙伊斯兰教法的法官和行政官员，因此，宗教学校在注重经注学、教法学和法理学等宗教课程的同时，还设置了许多属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课程，如古希腊的医学与天文学、波斯的古典文学等。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德拉萨教育体系的局限性逐渐显现，特别是随着伊斯兰思想体系创新能力的降低，传统的教育体系不仅不能容忍异己的文化与智力成果，而且极力反对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伊斯兰已有的文明。于是，除了以被动方式接受传统的知识，人们还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对传统知识的注释，以及对注释的注释上。迪奥班德经学院被誉为埃及艾资哈尔大学之外伊斯兰世界第二个著名的宗教大学。然而，在其鼎盛时期所进行的教育活动中，也极力排斥与宗教教育无关的课程，它虽然采用了西方现代教育管理的许多方法，但在教学内容上却从来不对任何革新企图让步，甚至一些有助于学生寻找工作的技能性训练也遭到严厉拒绝<sup>②</sup>。阿富汗的马德拉萨教育更是极为落后，仅有的宗教教育本身也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一位研究阿富汗教育的学者注意到，靠死记硬背学习阿拉伯语语法的学生既不能用阿拉伯语造句，也不能用阿拉伯语阅读，而对传统辩论艺术的掌握也不过是通过背诵“正确的”论据对标准化的问题提出反驳<sup>③</sup>。

## 苏菲主义

阿富汗，就像与之相邻的中亚和南亚次大陆一样，曾经是苏菲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早在公元9世纪，现在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Herat）、契斯特（Chisht）和贾姆（Jam）等城市就是伊斯兰世界著名的苏菲活动中心，这里不仅孕育了伊斯兰历史上最早的苏菲教团之一阿哈米教团（Adhamiya），而且产生了不少像阿布·伊斯梅尔·阿卜杜拉·安萨里（Abu Ismail Abdullah Ansari, 1005—1089）和贾拉尔·丁·鲁米（Jalal al-Din Rumi, 1207—1273）这样一些著名的苏菲派学者。特别是鲁米，他与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 1165—1240）及伊本·法里德（Ibn al-Farid, 1181—1235）并称为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巨匠，“这三位旷世奇才的生命跨越世纪

① See Asta Olesen, op. cit., p.43.

② See Bardara D. Metcalf, *Islamic Revival in British India: Deoband, 1860-19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00-103.

③ See Asta Olesen, op. cit., p.43.

(1165~1273 年), 给整个伊斯兰世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sup>①</sup>。进入近现代之后, 阿富汗的现代化努力和西方教育的兴起多少对苏菲主义产生了冲击。然而, 苏菲主义依然是阿富汗伊斯兰宗教信仰和社会习惯的主要特征。一位西方学者注意到, 在一些大村镇, 在喀布尔、赫拉特, 特别是在整个北部地区及坎大哈等地, 苏菲主义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一些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和社会阶层更有深深的苏菲主义情结, 而乌勒玛则大多属于某个苏菲教团。<sup>②</sup>

一般说来, 阿富汗主要受到 3 个苏菲教团的影响。第一个是契斯提教团。该教团由毛杜迪·契斯提 (1142~1236 年) 创建, 其最早的活动中心在阿富汗的契斯特, 毛杜迪·契斯提去世后, 教团在阿富汗的影响渐趋衰落, 特别是随着长期战乱的到来, 契斯提教团不得不离开阿富汗, 将活动中心迁到了印度的阿杰米尔。然而, 在长达几个世纪中, 契斯提教团一直与阿富汗西部地区联系密切, 特别是在哈里路德山谷和契斯提沙里夫周围, 契斯提教团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的乌勒玛阶层多数属于契斯提教团, 而城镇居民则大部分是契斯提苏菲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契斯提教团在这一地区约有 20 所马德拉萨, 每所宗教学校都有图书馆, 由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契斯提教团在这里过着某种与现代世界隔绝的生活。

卡迪里教团是阿富汗境内的第二个重要的苏菲教团, 其创始者是阿卜杜·卡迪尔·盖拉尼 (Abdul Qader Gailani, 1077/1078—1166)。卡迪里教团最早出现在巴格达, 大约在 14 世纪末或者 15 世纪传入印度, 并逐渐在次大陆立足。17 世纪, 印度卡迪里教团最著名的皮尔当属谢赫·纳乌萨德, 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不仅遍及印度北部, 而且远及阿富汗的喀布尔。和卓·穆哈马德·富扎伊尔就是师从纳乌萨德的喀布尔人, 他学成后返回家乡传播卡迪里派苏菲思想, 这大概是卡迪里教团进入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展开活动的最早纪录。19 世纪, 阿富汗地区内外部的各种矛盾互相交织、激烈异常。一方面, 英国加强了在阿富汗的殖民活动, 即将与沙皇俄国展开在亚洲腹地的竞争; 另一方面, 阿富汗地区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些重要力量开始角逐控制全国的权力。以卡迪里教团著名皮尔谢赫·纳兹穆·乌德丁 (又被称为哈达毛拉) 为代表的宗教人士深深地卷入了这一矛盾漩涡。据称, 哈达毛拉在楠格哈尔省建立了宗教中心, 其弟子与追随者约有 10 万之众, 整个阿富汗东部及与英印交界的边疆地区都处于他的影响之下。20 世纪初, 在埃米尔哈比布拉的邀请下, 巴格达纳齐布·萨希布 (“Naqib Sahib”, 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赐予卡迪里教团精神领袖的称号) 的兄弟哈扎拉特·纳齐布·萨希布来到阿富汗, 从此, 卡迪里教团在阿富汗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短短的数十年中, 崇高的宗教地位、与王室家族的联姻、雄厚的财力使盖拉尼家族迅速成为阿富汗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然而, 在阿富汗最具影响的还是纳格什班迪教团。该教团由布哈拉人巴哈乌丁·纳格什班德 (Bahauddin Naqshband, 1318—1489) 创建, 随后其信徒逐步把该教团道堂传向中亚各地和阿富汗的赫拉特、巴尔赫及巴达赫尚。在帖木尔帝国统治期间, 纳格什班迪教团在中亚的宗教和政治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sup>③</sup> 16 世纪初, 帖木尔帝国四分五裂, 在费尔干纳难以立身的帖木尔六世孙巴布尔不得已转向南部的阿富汗和印度拓展势力。1526 年, 巴布尔在著名的帕尼帕特 (Panipat) 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进入德里, 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巴布尔的征服活动对纳格什班迪教团在阿富汗和印度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 穆里德 (“Murid”, 弟子、学生) 和穆尔希德 (“Murshid”, 导师) 的旅行使中亚、阿富汗和印度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宗教联系<sup>④</sup>。不过, 纳格什班迪教团在印度和阿富汗的真正发展应归功于被誉为伊斯兰 “第二个千年复兴者 (Mujaddid-i Alf-i Thani)” 的纳格什班迪皮尔、谢赫

① 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 Bernard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622

② 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Second Ver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8.

③ 参见张文德著:《中亚苏菲主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32 页。

④ See Savid athar Abbis Rizvi, *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 Vol. II, *From Sixteenth Century to Modern Century*, New Delhi: Munshiram Mancharial Publishers Pvt. Ltd., 1983, pp. 174—180.

阿赫默德·锡尔欣迪 (Shaykh Ahmad Sirhindi, 1564—1624)。锡尔欣迪的一生一方面以正统教义为武器批判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宗教改革政策；另一方面，他以伊斯兰正统思想的复兴者自居，试图弥合伊斯兰教法与苏菲主义之间的鸿沟。锡尔欣迪的先祖原为喀布尔的总督，后来才移居印度的锡尔欣德，因此，锡尔欣迪与阿富汗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据记载，锡尔欣迪的继承者中有不少来自阿富汗，较著名的有毛拉纳阿赫默德、谢赫尤素甫和谢赫哈桑，他们在印度完成学业后，先后返回阿富汗宣传锡尔欣迪的宗教主张。在阿富汗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以穆贾迪迪家族为代表的苏菲道统就将其世系追溯到锡尔欣迪。

与阿富汗的其他宗教世家不同，穆贾迪迪家族深深地卷入了近代以来的国内政治纷争。19世纪20年代，穆贾迪迪家族参与或直接煽动了一系列动乱，以反对阿曼努拉国王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随后，他们与纳第尔兄弟结盟，成为穆萨希班王朝的坚定支持者。1953年之后，由于达乌德当政，穆贾迪迪家族与王室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于是一些家族成员旅居埃及，建立了与穆斯林兄弟会的直接联系。1979年1月，所有在阿富汗国内的穆贾迪迪家族男性成员被塔拉基政权杀害，从丹麦归来的萨布哈图拉·穆贾迪迪继任皮尔，直接卷入了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圣战”。回顾穆贾迪迪家族过去100年在阿富汗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可以用充满传奇和矛盾来概括，正如法国著名阿富汗学者罗伊所言：“他们与王室关系密切，但把整个国家的立法与习惯的西方化视为巨大灾难；他们富可敌国，但远离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他们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也是政治反对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保守派，但又与伊斯兰内部的某些极端潮流（政治伊斯兰）关系暧昧。”<sup>①</sup>

就像在印度次大陆一样，阿富汗以契斯提教团、卡迪里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为代表的苏菲教团与伊斯兰正统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未与正统信仰形成竞争，相反他们却是正统信仰坚定的维护者。他们重视内在的精神追求与功修，但同时也强调严格信守外在的伊斯兰教法的重要意义。在此，大部分皮尔也是伊斯兰正统派学识渊博的乌勒玛，而皮尔—穆里德的关系则恰如阿里姆 (alim)—塔利卜 (talib)——宗教学校师生——的关系。于是，他们被一些西方学者干脆称为正统派苏菲主义 (Orthodox Sufism)，而他们则以“塔里克沙里亚提”自诩，意为“坚持沙里亚教海的兄弟会”。<sup>②</sup>

除了这些正统苏菲教团，阿富汗还存在隐修式苏菲 (Maraboutic Sufism)。与正统苏菲的皮尔—穆里德基于个人效忠的师徒关系不同，隐修式苏菲所组成的是某种集体效忠关系，即一个部族、部落对某个皮尔家族表示忠诚与顺从，而皮尔则通过祈神赐福 (barakat) 使部族或部落获得真主的佑护。同时，在一般的苏菲教团中，齐克尔 (zikr) 被视为信徒们强化信仰、提高功修、净化灵魂的必须参加的宗教仪式；而在隐修式苏菲那里，齐克尔是由皮尔及其家族代表信徒举行的，信徒只需定期拜访皮尔 (比如说每年一次)、呈送一些礼物就可以表达对皮尔的忠诚，并获得皮尔的保护和祝福。这种较为特殊的苏菲主义主要流行于阿富汗的东部和跨边界的普什图部落区。由于阿富汗的早期历史文献从未谈到这种苏菲活动方式，于是，一些学者将隐修式苏菲的兴起归因于19世纪英国对阿富汗的侵略及毛拉在反侵略战争的作用：面对英国的殖民扩张，受到威胁的部落社会把伊斯兰看做抵御外侮的旗帜，由此隐修式苏菲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是宗教现象<sup>③</sup>。这种判断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在能够获得进一步的社会学资料之前，我们宁愿相信这是阿富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特殊的部落社会的产物。在这些地区，习惯法高于伊斯兰教法，部落领袖高于宗教领袖，隐修式苏菲与部族或部落的相对独立的关系，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另一方面则保持了部落结构的优先地位。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Olivier Roy, op. cit., (Second Version), p.43.

② Ibid.

③ Asta Olesen, op. cit., p.53.

## Islam in Afghanistan

*Dongfang Xiao*

pp.5 – 11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in Afghanistan, 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most Afghan people. However, due to complicated reasons, Islam has to share the mental world of the Afghan people with the pre – Islamic and non – Islamic beliefs. Owing to the tribal social characters, the religious class in Afghanistan, consisting of Mullahs, descendents of the Husayn family and the Sufi pirs, standing above or outside the

society, is a very special social group. Being accustomed to the divided and backward tribal social structure, religious establishments in Afghanistan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s a main part of the Afghan Islam, the Sufism not only exerts influences on the inner world of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fgha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Yang Fuchang*

pp.17 – 20

With rich resources and broad market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multi –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just fai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nd the increase of world economy. Today, the global issues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se international status is increasingly standing out. On the oth-

er h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atterns put them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he South – North gap is widened. As a member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lways pays attentions to establishing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broad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bases of mutual respect, solidarity,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Yao Daxue & Li Fangzhou*

pp.31 – 36

Facing the swift tide of globalization,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timely economic reforms, which have touched upo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national reform from colonial and semi – colonial economy to state – owned economy, re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privatization reform from state – owned econ-

omy to privately run economy, reform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import substituting economy to export – oriented economy, liberal reform from protective tariffs to open markets, diversification reform from sole dependence on oil production to diversified economy. These reforms have yielded obvious results, yet some problems remain to be solved earnestly.